

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304頁。

安劭凡*

有關抗日戰爭的研究通常多關注政治、軍事、外交等重大問題，而較少涉及社會文化與民眾日常生活。以近年來的各種抗戰史學術會議為例，其關注主題仍較為集中於抗日戰爭的重大標誌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包括盧溝橋事變與蔣介石、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日軍暴行、戰後審判、中共抗日根據地等等。儘管如此，抗戰時期的社會生活也開始逐漸進入青年學者的關注視野之中，部分研究已關注到毒品、乞丐、自殺等戰時社會問題，也包括戰時校園生活、漢奸問題、慈善團體與社會救助等議題。然而，對抗戰時期的研究下探到市民百姓或一般下層民眾衣食住行等基本日常生活者尚未多見。¹巫仁恕的新著可謂極大地彌補了這一缺憾。正如作者所言，既有的對於淪陷區城市生活的研究存在著集中於大型城市、多關注上層菁英人物、以抗戰為單線論述主軸等局限，因而其對蘇州普通民眾日常生活（Daily Life）的關注，以及「由下而上看歷史」（Bottom-up Perspective）的新文化史取徑，可以說在選題與視

* 澳門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¹ 分別見王熹，〈「史料與視角：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綜述〉，《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4期，頁151-156；劉長林、章林，〈「抗日戰爭時期的社會生活學術研討會」綜述〉，《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頁154-159；董為民，〈「第三屆抗日戰爭史青年學者研討會」綜述〉，《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頁153-158；王峰、江沛，〈新意迭出，未來可期：「第四屆抗日戰爭史青年學者研討會」綜述〉，《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2期，頁153-158；都斌、李鑫，〈第五屆海峽兩岸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綜述〉，《抗戰史料研究》，2015年第2輯，頁140-148。

角上均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當時淪陷區的百姓如何渡過那八年」？（序頁 v）這是作者希望考察的傳統抗戰歷史研究中「抗敵」戰場之外的重要面向。作者的結論與以往對淪陷區城市的既有印象頗不相同，即淪陷區內的蘇州不但沒有經濟蕭條，反而出現了「畸形繁榮」的社會生活，人們對飲茶、餐飲、旅行乃至鴉片的消費需求不減反增，甚至還要高於淪陷前的消費水平。由「畸形」現象著手，作者系統地考察了淪陷的蘇州城市經濟繁榮的原因，以期揭示其背後的結構性變化。

就史料方面而言，作者以抗戰時期蘇州發行的地方性報紙《蘇州新報》（1938-1941）和《江蘇日報》（1941-1945）為基本史料，此外還廣泛引用了蘇州市檔案館的同業公會檔案、名人遊記或日記，以及文史資料等口述材料。其中尤可注目者是對當時出版的多種旅行手冊及城市導覽冊的使用，作者並闢有專門的附錄，對此類新材料進行了系統性的介紹與分析。

全書體例標準，結構亦清晰，共分六章。前兩章分別以「從傳統走向現代」和「從天堂到地獄」為題，具體考察淪陷前和淪陷初期蘇州「四館業」（茶館、菜館、旅館及煙館）的演變過程與相應的時代背景。首章分別介紹蘇州城市的近代發展，以及伴隨其中的茶館的新舊並陳、由客棧到現代旅館的轉換、傳統酒樓到現代地方菜館的演變，以及現代意義上的戒煙所的出現。第二章介紹 1937 年 11 月前後蘇州淪陷至 1939 年下半年逐步恢復社會與經濟秩序的過程。第三至六章分別從這一時期的茶館、菜館、旅館和煙館的經營與消費等諸多面向進行具體考察。就「四館業」中的茶館業而言，作者對蘇州茶館業探究的基本結論亦驗證了既有的關於民國時期成都茶館業的認識，即政治力量不但深入到作為抗戰大後方的成都茶館，也同樣滲透到了淪陷區的蘇州茶館內。²當然，如果能進一步分析蘇州茶館業之於成都茶館業的異同，似乎更能體現淪陷時期蘇州城市生活的特點。而在菜館業方面，作者指出，影響菜館空間分布變

²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394-402。

化的主要因素有三，包括戰爭因素導致蘇州閭門內外傳統茶館業重心式微，鐵路取代河道碼頭作為城市交通樞紐，導致菜館向火車站周邊聚集，以及蘇州成為省會後帶來新增政府機構附近的菜館業的興盛。旅館業之興盛則較茶館與菜館業更能體現淪陷時期蘇州人口的流動性乃至旅遊業之發達。尤可注意者，乃旅社業同業公會和旅業職業工會在旅館業者與縣政府之間的博弈中所發揮的中介作用。而煙館業方面，由於鴉片吸食所本就具有的道德敏感性，對其強勢禁絕往往成為汪政府為加強統治合法性以及獲得淪陷區居民支持而不得不做出的唯一選擇。

作為一部社會文化史取徑的著作，本書致力於探討四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淪陷時期蘇州的休閒業何以出現當地報紙所稱的「畸形繁榮」的現象？其次，如何評估淪陷區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統治能力？第三，對於休閒業者而言，他們如何在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中應對新政權的統治與稅收政策？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蘇州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繁榮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其在抗戰史乃至近代社會文化史中的意義應當如何理解？

對於蘇州淪陷後的畸形繁榮，作者認為，戰爭帶來的人口遷移，尤其逃難人口湧入社會治安與物價相對穩定的蘇州城內，是造成這種不同於其他多數淪陷區城市的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隨著汪政權將蘇州拔擢為其統治範圍內的江蘇省省會，大量公務人員與政要名流進入蘇州。為迎合他們對衣食住行方面較高水平的消費需求，蘇州城內的茶館業、旅遊業與食品業等得以獲得更大的盈利空間，擴大經營規模。與此同時，出於對戰爭結果的不確定感以及暫求安樂的社會心理，多數民眾抱有及時行樂以逃避現實的心態，這也在客觀上造成了汪氏統治下的蘇州的社會經濟繁榮。當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這種繁榮只是徒有其表，實則貧富分化已很嚴重。

關於淪陷區政權的政治控制能力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作者傾向於擺脫以往研究中對其政權性質或「傀儡」或「協力」（Collaboration，又譯作「合作」）的兩極化評價，而從「市民大眾的生活，來評估汪政權在淪陷區的角色與其所

發揮的作用」（頁 262）。對「四館業」的考察令作者發現汪政權在蘇州不斷嘗試擴大其稅收的範圍與比例，更嘗試將部分地方稅收收歸中央，因而其統治力量已逐步深入到城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實上，其他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作者這一結論。³

與此同時，從作為休閒行業的從業者的角度出發，作者考察了其在日常生活與經營中應對汪政權統治的生存策略（Survival Strategy）。在政府與休閒業從業者之間，同業公會實際上起到了關鍵的溝通作用。總體而言，同業公會在戰前基本可以代表和反映從業者的訴求，乃至阻止新稅的徵收。然而隨著汪政權對同業公會的不斷改組，後者逐漸淪為政府的附庸，不再具有代表從業者在經營與稅收方面與政府博奕的能力。儘管如此，政府並不能完全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茶館業者對政府限價令的陽奉陰違以及重要物資配給制外的繁榮「黑市」等現象均能說明，「休閒產業者為了生存，也試圖在日常中反抗政府的各種剝削與管制政策」（頁 265）。

至於蘇州的「畸形繁榮」特徵是否在戰爭狀態下淪陷區城市中具有代表性，作者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認為蘇州在淪陷時期社會經濟反常的繁榮代表著「歷史上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形態」，即一種「戰爭下的繁榮城市」。這類城市往往因較其他多數淪陷區城市而言社會相對安定而吸引外來移居者；且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會帶來大量貿易；政權中心的設置亦導致大量公務人員的聚集。當然，淪陷區的城市並不必然皆因戰爭而繁榮，但這類城市仍有著一些共同的消費習慣與社會心理。戰爭帶來的大量不同地域人群的遷移和向「戰爭下的繁榮城市」的湧入使得茶館、餐飲等行業有了更多種不同的顧客群體，而充滿不確定性的戰爭導致的及時行樂心態也同樣助長著不論是淪陷區還是大後

³ 王笛對民國時期成都茶館的研究同樣指出，政府對地方茶館業種種繁複的規定與限制實際上代表著國家權力向地方社會不斷滲透。但王對此得出的結論似乎與巫氏恰恰相反，他認為以茶館業為代表的地方文化與社會力量雖然面臨著國家文化和政治控制的不斷入侵，但並沒有迅速消解，而是仍然具有頑強的韌性：「茶館經營方法、競爭、僱傭等方面，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因而國家力量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和滲透仍有其限度。見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頁 440-444。

方的餐飲業消費。

總體而言，本書為讀者展示了潛藏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中「抗敵」主題之下的「另一面向」，即淪陷區的社會生活。正如作者所言，雖然抗戰時期的淪陷區佔中國領土將近三分之一，人口佔中國近半，但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仍以「抗敵」作為絕對的關注焦點，相對而言，淪陷區的歷史則或由於主觀上對重大問題、重大理論的關注，或出於對民族主義乃至意識形態執拗的規避，而多少被學者有意無意地忽略。⁴本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樣的缺憾。尤其是作者以蘇州當地報紙對「四館業」畸形繁榮的生動評論入手，並進行細緻的分類分析，以貼近一般大眾的視角重構人們對淪陷區經濟社會生活的認識，視角新穎，眼光獨到。首先，由當時報刊評論出發，本身就表明蘇州社會以「四館業」為代表的這一「畸形繁榮」現象在當時的媒體和社會上有著較為一致的共識，並非是後來研究者的概括，因而具有較高的客觀性。其次，茶館、菜館、旅館與煙館分別代表了蘇州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既有各自專章討論行業內部具體的情況，亦可以四章篇幅形成全書的主幹，管窺淪陷時期蘇州社會生活的總體相貌。

除了這一獨闢蹊徑的視角外，本書在視覺材料的運用上也有為人稱道之處。全書共引用了 20 幅圖片，包括各種圖冊內的蘇州老照片、報刊上的漫畫，乃至在舊地圖基礎上由作者重新繪製的茶館業空間分布示意圖：第四章對菜館業的分析引入了電腦繪圖技術，在既有的城市地圖基礎上，利用 QGIS 軟體進行了熱力圖（heat map）的繪製，以反映蘇州城內眾多菜館的空間位置變遷，頗具新意。這些圖像不但為讀者勾勒出更為直觀的蘇州城市社會生活圖景，更部分彌補了文字材料的意不能盡之處。不過圖像材料的局限性作者未及分析，此點不無遺憾。⁵

⁴ 王克文，〈歐美學者對抗戰時期中國淪陷區的研究〉，《歷史研究》，2000 年第 5 期，頁 170-179。

⁵ 正如一些社會文化史學者已經指出的，在使用看似「客觀」的視覺材料時，更應注意到其中可能存在的主觀和想像成分。見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頁 54-57。

當然，本書並非白璧無瑕，在一些細節方面仍有可商榷之處。比如，作者認為「淪陷區的茶館所呈現的抵抗政治學，和大後方成都的茶館不同，後者針對的是敵人，而前者針對的是偽政府。」（頁 265）實際上成都的茶館業者雖身處「大後方」，但其日常抵抗的對象也並非以「敵人」日本為主，而更多地是以成都的實際統治者——國民政府為目標。如《華西晚報》上的一篇文章便以譏諷的口氣諷刺國民政府日益嚴密的規章管控，矛頭並非指向日本。⁶又如對於政府管控力度的評估，其實還有推敲的餘地。作者論及煙民需憑政府所發執照方可購買鴉片時，從政府規定的換照時間不斷緊縮來論證政府對鴉片管控力度的增加；但又指出報紙上仍載有許多無照煙民吸食的现象，未及更進一步的分析（頁 229-230）。如果政府管控鴉片確實力度空前，又怎會有大量無照吸食的现象存在？這一现象是否恰反證政府的管控能力並不如官方的文本規定所顯示的那樣嚴密？此外還有一些細小的文字錯誤，例如引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時，將編者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寫成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頁 8，其後注皆誤），應為作者筆誤，此處不贅。

總之，本書是近年來抗戰史研究中難得的社會文化史佳作，不但挑戰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淪陷區城市生活大多一片蕭條的刻板印象，而且對「戰爭下的繁榮城市」這一獨特的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分析，結論亦令人信服。通過本書的研究，我們不難管窺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所要解決的最基本問題——「當時淪陷區的百姓如何渡過那八年」的一種歷史相貌。然而，我們對淪陷區民眾的生活仍然缺乏足夠的瞭解，底層民眾究竟能否在歷史上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戰爭造成的難民流動，以及其向蘇州這類社會秩序穩定的淪陷區城市的湧入，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刺激蘇州茶館、菜館、旅館乃至煙館的消費？在戰爭陰影下生活的普羅大眾面對「敵」、「我」、「偽」或之間或之外的選擇時，他們究竟如何判別或界定自己眼中的通敵抑或合作？作者的研究已作出回答此類問題的很好嘗試，但類似的諸多議題仍有待後進學人不懈探索。

⁶ 居格，〈理想的茶館〉，《華西晚報》1942年10月17日，轉引自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頁 401-402。